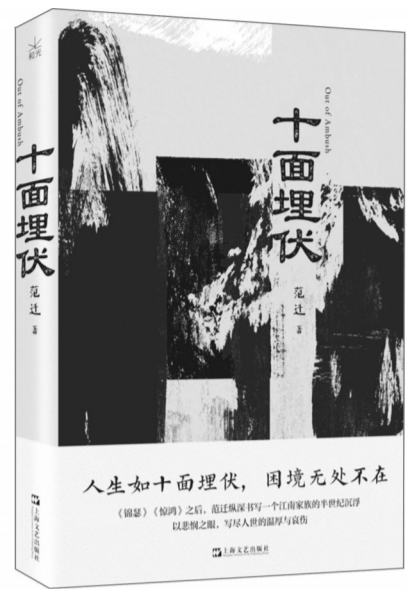


# 无问西东：历史洪流中的人生切片

华筠



作家范迁的长篇小说《十面埋伏》以20余万字的篇幅，讲述了霍家三代人在半个多世纪中的命运沉浮。范迁此前已凭借《锦瑟》《惊鸿》等作品在文坛确立声名，而这部新作无疑将他推向了一个更为深邃的创作境地。然而，这部作品最值得关注的，或许并非其精湛的艺术技艺，而是它所呈现的一种独特的叙事伦理：在“卸下宏大叙事”的自觉中，以“小人物的生活切片”记录时代的沧海桑田。这种写作姿态，构成了对当代文学中历史叙述方式的一种重要补充。

《十面埋伏》的叙事结构采取了一种看似“老实”的顺时叙述，时间跨度半个多世纪。这种结构方式，在文学批评中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大河小说”——特指描写几代人命运的大型长篇小说。范迁的这部作

品确实配得上这个称谓：霍家三代人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载沉载浮，从西得古镇的老宅出发，走向上海、延安、伦敦、南洋，有人出走，有人归返，有人入世，有人出世。范迁在这部家族小说中采用了一种颇具特色的叙事策略：总体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却又巧妙地插入霍文田的日记，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串联起其他人物的故事。正如评论者所言，“平缓的河面被投掷入一块石子，那一圈圈的涟漪便是‘我’的观察和感受”。这种双重叙事视角的运用，使得小说既有宏观的历史纵深感，又有微观的情感细腻度。更重要的是，日记作为一种私密性的文体，天然地与“卸下宏大叙事”的写作意图相契合——它记录的从来不是官方历史，而是个人记忆；不是时代风云，而是日常细碎。小说的核心空间是浙江西得古镇的霍家大院。这座因战乱而斑驳荒凉的百年老宅，因霍家的归来而重新焕发生机。青石板路泛着水光，天井里桂花开了又谢，饮食烟火、日常器物，都浸润着深厚清灵的古典审美意境。小说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当属体弱多病的霍文田。这个“七岁能通背全唐诗三百首，九岁读完诸子百家”的少年，“并无师自通地弹得一手好琵琶”。十岁时一闻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听得名师刘寿椿热泪盈眶，直呼“这孩子是个奇才，音律前途不可估量。”然而命运并未眷顾这个天才少年。他没有像兄弟那样闯荡世界，而是守在故土，以一己之身承载家族的记忆与命运。他的后半生，就在水边慢慢消磨掉了，晚年患上类风湿关节炎，再也弹不好那首《十面埋伏》了。琵琶名曲《十面埋伏》在小说中仅出

现三处：文田少年时以此曲惊艳名师，为临终的霍父弹奏此曲，以及小说结尾处提及他再也弹不好此曲了。这三处描写构成了一条隐性的命运线索——从少年惊艳到临终送别，再到最后的失落，文田的一生仿佛就是这首曲子的具象化。范迁阐释了书名的深意：“‘十面埋伏’并不一定就是指战场上的处境，一个人，本来身体很健康，到了老年，中风了，很多事情自己不能料理，被生活和疾病包围了，也是十面埋伏。”换言之，“十面埋伏”是人生的常态——我们永远被各种困境包围，社会的、家庭的、内心的。《十面埋伏》的叙事伦理，核心在于一种“去宏大叙事”的自觉努力。不直接书写历史，而是通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折射历史；不追求史诗般的宏大场面，而是专注于日常的细碎与繁杂。这种写作策略在《十面埋伏》中体现为：对历史事件不作正面铺陈，而是通过人物的日常遭遇来侧写；对时代风云不作全景描绘，而是通过个体的命运起伏来折射。小说中的人物都不是历史中的大人物，而是“时代筛漏下来那些人，也许颓丧和落魄，但灵魂独特”。范迁的文字具有极强的画面感，读他的小说就像在看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这种视觉性并非简单的景物描写，而是一种审美意识的自然流露。范迁本人也承认绘画对他的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写作和绘画同出一源，由外及里，再在内心发酵，酿出美酒来。”但他强调，绘画对写作最大的帮助不在于如何进行细节描写，而在于“对审美的影响”。这种审美影响体现在《十面埋伏》的方方面面：语言的节制与留白，意象的选择与组合，整体氛围的营造与控制。在水墨的基础上，刻画

出画面的色彩和光影，融雪翻腾着黑白灰三色，板壁在赭黄色中叠加深褐色，灰绿色的水流与黑棚顶的鸟篷船辉映。这种视觉语言的运用，使小说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艺术质感。“去宏大叙事”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历史的思考。相反，正是通过这些小人物的人生切片，范迁展示出历史与个人最深切的纠缠。如果说《十面埋伏》仅仅停留于讲述一个家族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起伏，那么它或许只是一部优秀的家族小说。但这部作品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触及了一个更为深层的哲学命题：如何面对困境？范迁给出的答案，不是逃离，而是与之共处；不是抗争，而是理解与承受。小说中有一段关于“劫”的论述，堪称全书的哲学注脚，既是小说人物对命运的感悟，也寄寓隐含着作者对世事无常的沉思。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实践这种“共处之道”：文田没能改变自己的处境，没能摆脱家族的命运，没能守住自己的琵琶，但他守住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他没有被仇恨吞噬，没有被命运击垮。他活着，看着，记着。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这不是消极的认命，而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智慧——认识到人生的荒诞与无常，然后依然选择守住内心的清明。小说中霍文田这种“共处之道”，道出了这种智慧的来源：“唯太阳和人心不可直视。唯亲情和内心平安不可辜负。”这段话出现在小说结尾处，堪称全书的精神内核——面对不可知的命运，人所能做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守护内心；不是战胜困境，而是与之共存。从《锦瑟》到《惊鸿》再到《十面埋伏》，范迁一直在书写历史洪流中的个体命运，一直在追问面对困境的可能姿态。

## 故宫之学的登堂入室之作

范军

最近，收到章宏伟先生的新作《故宫学十讲》（商务印书馆2026年2月出版，收入“故宫学研究丛书”）。这是作者深耕故宫学的又一精品力作，它的面世对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促进故宫文化遗产的理论探索与成果转化，皆有重要意义。作为学术概念的“故宫学”是2003年由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先生提出的。故宫学的提出，是立足于对故宫及故宫博物院的认识和定位、对故宫学术研究的现状以及80多年来故宫研究的调查与考察的。郑欣森院长身体力行对故宫学进行了学理上的初步论证，并有《故宫与故宫学》的专著刊行（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此后，他在《故宫学纲要》（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6期）更加明确地对故宫学的研究对象予以界定，指出故宫学“是以故宫及其历史文化内涵为研究对象，集整理、研究、保护与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学问和学科”。具体来说，它要研究故宫古建筑、故宫馆藏、故宫博物院。20多年

来，故宫学得到学术界和文博界的持续关注，尤其是故宫博物院与多所高等院校合作，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项目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为推动故宫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故宫博物院专门成立了故宫学研究所，章宏伟便是这个研究所的首任所长。近20年来，他在故宫学这个新的领域里不断开掘，勤奋耕耘，春秋秋收，成果累累。在《故宫学十讲》出版前，章宏伟已有《故宫问学》《故宫学的视野》《作为学问的故宫学》《故宫学入门：1924—1949》等多种专著行世，此外还主编《故宫学研究》集刊，《故宫学与明代政治》论文集，策划并制作了大型纪录片《故宫》等。而这本《故宫学十讲》，紧紧围绕故宫学展开，以十个专题探索其历史与发展，主题涵盖了故宫学的对象、体系还有起源，故宫学研究的历程与展望，民国以及当代的故宫博物院出版事业，故宫博物院藏古琴考察等。有关故宫学的知识，该书内容专精中有渊博，普及中又注重提升。在《故宫学十讲》中，有三讲是关

于故宫与出版的，属于中国古代出版史范畴。如第五讲《清代前期的满文教育与满文出版》，就是过去出版史研究中极少有人问津的领域。作者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将满文出版史的研究大大深化了。第八讲《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出版事业》，是作者为参加本人主持的第一届华中学术传播论坛（学术·学科·学报）提交的论文，曾收入会议后刊行的论文集。在这一讲中，作者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考据，梳理和论证了故宫博物院出版事业是如何开端，又是如何走向繁荣的。作者还对沦陷时期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出版活动、抗战胜利后故宫博物院的出版变化均有细致论述，最后就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成就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给人启发。至于该书第九讲《故宫出版新篇章——从图书出版到文创融合》，则是作者对故宫出版社自1983年成立至2024年40多年出版工作及成就的回顾与总结。这与作者曾较长时间主政故宫出版社社政有密切关系，作者

在担任故宫学研究所所长之外，还曾担任过故宫出版社社长多年，较早就致力于故宫出版史的研究，他所撰《出版文化史论》《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等专著中，就不乏关于故宫博物院出版活动的独到探讨，别开生面，颇有影响。作为故宫学学科建设的核心推动者与重要实践者，章宏伟以“文献实证+跨学科整合+学科体系构建”为特色，在故宫学理论、明清宫史、清宫出版与典籍、故宫博物院院史等领域成果丰硕，极大拓展了故宫学的研究边界与社会影响力。在《故宫学十讲》的“后记”中，章宏伟对故宫学研究的未来作了充满激情的展望。他如数家珍地列举了故宫学尚待开掘和深化的方面，诸如紫禁城的规划、肇建与沿革；紫禁城的主人及其家庭、服务人员，以及相关机构与制度；元明清三朝的宫廷礼仪等等。作者还提出要重视故宫博物院相关的博物馆学、旅游学研究等。我们有理由期待作者推出更多新的更具拓展性、创造性的故宫学新著。

## 读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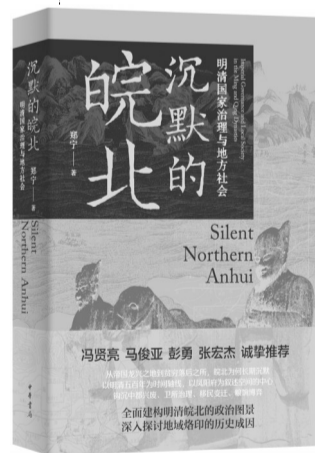
### 珍奇柜里的万象

李海卉

今年1月，两部捕捉历史当事者声音的新书同时面世，并引起关注，即袁克定所著的《大清万象：清代日记中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与袁克定所著的《蜀乱：一个晚明小吏的流亡史》。一部是研究清代的学术著作，一部是以晚明小吏流亡经历为线索的历史纪实，二者都以平视式的个案探微，打捞那些被正史遮蔽的个人经验。《大清万象：清代日记中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以下简称《大清万象》）的出版，为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日记研究增添了一部重要作品。正如书名“万象”所示，作者仿佛在我们面前打开了“珍奇柜”。书中主题涵盖了从国家大事到个人琐碎的广阔光谱，从清代文人“新年发笔”的文字习俗，到曾国藩酷爱围棋的私人嗜好；从知县周长森的阅读世界，到小京官恩光的隐秘情事；从袁氏部曾折的乱世心路，到大名士王闿运的口腹之欲。《大清万象》不仅是关于清代社会生活的知识性读物，更是一部关于如何阅读日记的“方法书”。作者试图突破将日记作为单纯史料引用的常规做法，引入书籍史、情感史、饮食史等新视角，让日记从史料库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叙述方式。如果说《大清万象》是日记研究的“方法展演”，那么袁克定的《蜀乱：一个晚明小吏的流亡史》（以下简称《蜀乱》）则是一次历史叙事的实验——它试图用历史当事人的个人视角，重构一个时代的图景。袁克定选择的叙述主线，是明末清初蜀乱中一个真实存在的小人物——欧阳直。欧阳直是四川广安人，明末时被张献忠俘获，经历了多次生死劫难，流亡数千里，最终在云南楚雄度过晚年，写下记录一生经历的《蜀警录》，它浓缩了一个亲历者对蜀地历史的深刻洞察。袁克定以欧阳直《蜀警录》为核心史料，同时融合《蜀碧》《荒书》等其他亲历者笔记，甚至引入欧洲传教士的目击记录，试图实现多维度、跨视角的史料互证。作者说：“本书可以视为纪实文学作品，书中的故事，基本来自历史当事者的记录。”《蜀乱》选择将个人视角贯穿始终，让读者跟随这个具体的人，经历他的恐惧、挣扎与抉择。书中呈现的不仅是一幅晚明蜀乱的宏观图景，更展现了一个普通读书人在乱世中从“天真书生”到“生存大师”的蜕变过程。无论是清代日记的系统整理，还是明末清初笔记的重新发现，都在推动一种从“历史是什么”到“历史如何被感知”的视角转变。《大清万象》作者坦言：“我想通过这些日记，把英雄伟人的小爱好、普通人的大坚守、寻常人的寻常事等都看得更加清楚。”《蜀乱》则试图通过一个人物，烛照一个时代，让那些被史书简化为数字的逝者，重新获得具体的面容与命运。当我们翻开一册册日记，当我们跟随欧阳直流亡，我们不仅在阅读历史，更在与古人对话。那些被正史遗忘的情感与经验，在日记与流亡记的字里行间，重新获得了呼吸的空间。这或许正是历史书写最动人的地方——它让我们相信，即使是最卑微的生命，也值得被记录；即使是再遥远的过去，也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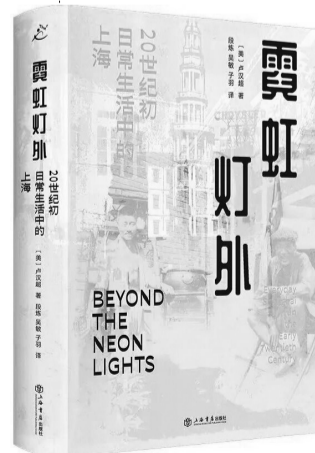
### 荐书

### 珍贵的生活画卷



《沉默的皖北：明清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  
中华书局

在明清两朝的统治下，皖北经历了大起大落，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地域风貌。本书以明清500年间皖北的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重点探查其中关联的利弊纷争、权力博弈与政策抉择，以期读者对明清以来皖北的历史进程与社会风貌形成更进一步的认知。



《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基于丰富史料和平民视角，学者卢汉超系统研究了20世纪初上海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梳理了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过程。他再现了上海棚户区及石库门里弄的生活场景，呈现了一幅近代上海市井生活画卷，体现了传统力量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非凡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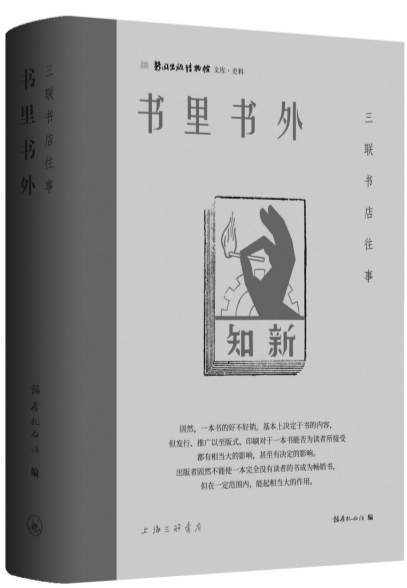


《致克拉拉的信》  
译林出版社

胡安·鲁尔福是墨西哥小说家，被誉为“拉丁美洲新小说的先驱”。魔幻现实主义开山鼻祖。《致克拉拉的信》是其重要作品，作家爱妻子的书信首度公开。书中收录了这位墨西哥文学巨匠在1944年至1950年间写给爱人的系列书信，包含数张照片及珍贵手稿。

## 书里书外的“手艺活儿”

郑坤



韬奋纪念馆编、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书里书外》取材于三联书店内刊《联谊通讯》的作品，通过“书里”与“书外”的双重视角，不仅记录了一段出版史，更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出版精神”——这种精神并非虚无缥缈的理念，而是扎根于日常实务中的“手艺活儿”。

出版物具有自身生命历程的有机体。从选题的孕育、作者的寻找、文稿的打磨，到纸张的选择、版式的设计，再到印刷、发行、宣传，每一个环节都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质感。书中呈现的“老三联人”对出版物的态度，体现了一种虔诚与工匠般的精准。一位老编辑回忆校对过程的文字令人动容：“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要反复核对。有时为了一处史实的准确性，要翻阅十几本参考书。这不是苛求，而是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书里书外》通过大量细节展示，将这种对出版物生命质量的严格把控还原为一个具体的、日常的、几乎琐碎的实务操作。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工作，构成了出版物真实而完整生命历程。书中收录的一封编辑与作者之间的通信特别引人深思。信中，编辑就书稿中某一点点的表述方式与作者反复商讨，既尊重作者的学术判断，又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最终找到了既准确又通俗的表达方式。这种编辑与作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正是出版物生命得以丰富和提升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书里”部分展现的是出版物从无到有的诞生过程，那么“书外”部分则将目光投向了书店日常运转的方方面面。邮购、通信、门市、油印等各门类工作，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或许显得过于日常、过于普通，

甚至有些过时了。然而，《书里书外》恰恰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环节中，发现了书店作为文化机构的深层意义。邮购业务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是书店与远方读者建立联系的重要纽带。《书里书外》中记载的邮购故事令人动容：一位边疆地区的教师通过邮购订购三联书店的图书长达30年，每一本书都为他的教学带来新的启发；一位偏远山区的学生省下生活费邮购《新华文摘》，打开了通向广阔世界的一扇窗。在这些故事中，书店不再仅仅是图书的销售场所，而是成了知识传播与文化交流的枢纽。门市工作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书中描述的老门市店员的回忆，将我们带回那个“每位店员都能向读者推荐适合的图书”的年代。这不仅需要丰富的图书知识，更需要理解读者的需求与兴趣。一位老店员回忆：“不是简单地卖书，而是帮助读者找到他真正需要的书。有时读者自己也不清楚需要什么，需要通过交谈来发现。”这种深度的为读者服务，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商业行为，成为一种文化启蒙实践。油印室的故事则揭示了书店作为文化机构背后的物质基础。在技术条件相对落后的年代，油印室承担着宣传资料、内部刊物、业务文件的印制工作。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油印品，构成了书店与读者、书店与作者、书店内部之间信息流通的物

质载体。《书里书外》通过对这些“幕后”工作的记录，还原了书店作为一个复杂文化机构的完整图景。在专业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整体性视野显得尤为珍贵。《书里书外》通过这些多层面的互构关系，向我们展示了出版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整体性特征。它提醒我们，出版的各个环节——从内容生产到流通渠道——都是相互关联的，任何环节的弱化都会影响整个文化传播的效果。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传统出版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老三联人”的经验能带来哪些启示？书里的视角提醒，内容品质始终是出版的核心竞争力。无论技术如何变革，读者对优质内容的需求不会改变。正如书中一位老店员所言：“卖书不是目的，传播文化才是。”这句话在今天依然有力。《书里书外》中展现的敬业、专注、负责的职业态度，是一种可贵的精神财富。出版不仅是一门生意，更是一种文化使命。《书里书外》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将出版精神还原为日常实务。正是那些日复一日的、看似平凡的实务操作，构成了出版作为文化实践的真实图景。在数字时代重拾这种精神，需要我们既关注“书里”，也关注“书外”，在实务中寻找精神的根基。回到实务，重新出发，将出版作为一种“手艺活儿”来传承和发展。